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6)05-0090-06

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新时代使命 及其改革策略

陈 玥^{1,2}, 翟 月³

(1.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西安 710062; 2.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西安 710100)

摘要: 21世纪以来,美国博士生教育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时代使命:培养属于“世界公民”的博士生;积蓄力量增强博士生教育的全球吸引力;肩负提升博士生教育创新力与竞争力的重任。这为未来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契机。总体而言,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改革策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构建知识共同体,推动“面向世界”的博士生培养;加强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博士生教育的全球吸引力与竞争力;明晰多方问责职责,增强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创新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 博士生教育; 时代使命; 改革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其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与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纵观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打破了殖民主义的传统,而且打碎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藩篱。同时,美国博士生教育不仅选择性地借鉴和移植了德国的模式,而且对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学院进行了相应地改造,从而逐渐发展起适合美国国情与经济发展的博士生教育。正是这种孜孜不倦、锐意改革创新的精神,使美国博士生教育日趋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和频频效仿的范例。然而,步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博士生教育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时代使命,这不仅为未来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和有效运行指明了方向,也为其博士生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契机。那么,21世纪以来,美

国博士生教育究竟面临了什么样的时代使命? 其改革策略又是怎样?

一、美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

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始于德国,尤其是柏林大学更是开启了研究生教育的先河,对欧洲、美洲等诸多国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惠国,当时大批留德归国的学生返回美国后基本都留在大学任教,成为美国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这些归国博士不仅带来了德国大学关于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些新理念,而且也为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约翰·布鲁巴克(John S. Brubacher)曾指出:“德国大学的学术成就对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冲击,是现代文化史中最具价值的论题之一。”^[1]

收稿日期: 2016-05-11

作者简介: 陈玥(1984-),男,陕西周至人,陕西师大教育学院讲师,北京师大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翟月(1984-),女,辽宁大连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国家青年课题“中美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比较研究”(编号:CDA150129)

鲍德里奇(J. Victor Baldridge)也曾指出:“德国的影响比其它任何单一的影响因素都要巨大。它不仅给予美国高等教育赋予了新的动力,而且永久地改变了美国教育的特征。”^[2]然而,由于当时相关条件的限制,美国尚不具备开展高深学习的一些条件,直到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才正式开启了美国现代博士生教育的大门,使其拥有了名副其实的博士生教育。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博士生教育已经脱离了19世纪初在大学中次要的、陪衬的地位,逐步实现了正规化和制度化的发展。19世纪末,美国博士生教育变革了德国学徒式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创立了研究生院这一高级层次,较好地安排了科研与高层次的训练,这也使美国博士生教育地位得以确立,揭开了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新篇章。

20世纪初至60年代,美国博士生教育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由于受到苏联卫星发射的影响,联邦政府更是将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的发展置于保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将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点。可以说,《国防教育法》所形成的“国防教育法时代”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正如前哈佛大学校长普西对此时期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评价,他认为“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盛名更多的是由于在研究生教育(包括博士后培养),科研和科研训练而非在本科生教育方面的进步所酿成的”。^[3]由于美国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后”的国家,科学技术以及高质量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所以作为培养高质量科技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也被提上重要议程。

随着美国博士生数量的激增以及博士生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博士生培养目标和质量方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虽然美国博士生教育在上一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但70年代后,由于受到越南战争中的失利、劳动力市场不景气所致的文凭贬值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联邦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博士生教育的直接资助大幅削减,使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进入了萧条时期。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博士生教育也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与批评,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博士生教育相关方面的变革。^[4]从8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相关措施加大对博士生教育的科研经费资助,以此促进博士生教育的稳步发展。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竞争已经转为关于知识、技术和

人才的竞争,所以美国大学也试图通过加强留学生教育和教师的国际交流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此影响下,美国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也逐渐转向国际化,开始注重培养能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跨学科国际型人才。

二、21世纪以来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新时代使命

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教育问题研究,可以使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变迁脉络以及发展谱系进行充分理解和深度挖掘,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因此而更加深入。^[5]通过对美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一直在变革中坚守博士生教育的目的和质量。当然,在步入21世纪以后,美国博士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时代使命。

(一)培养属于“世界公民”的博士生

博士生教育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国际理解以及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人类进入新千年之际,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新的变革形势。2005年,来自六大洲、十四个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专家学者齐聚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共同商讨未来全球范围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并勾勒出未来全球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蓝图,最终形成了博士生教育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即《西雅图宣言》,该纲领制定了博士生教育未来的研究议程。《西雅图宣言》指出:^[6]在全球高等教育内涵的日趋复杂化以及它对研究生教育重大影响的背景下,应当努力建立本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更加公平的教育体系。具体而言,培养属于“世界公民”的博士生,这种世界公民应当是跨越国界接受差异性与多样性,而不是力图去吸收和同化。如果我们不关心和理解当今博士生教育的动力,并致力于形成未来全球性与多样性的博士生教育,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利用的能力。当面临日益复杂的、全球的以及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时,我们将会参与到革新性和创造性问题的解决。我们不仅需要多元化的视角来理解全球的动态,而且需要它来形成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如果博士生教育不能使人们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将会造成脑力资源的浪费。总体来讲,该宣言的发布对于理解当前博士生教育的动力以及在全球多样性的大背景下开展未来的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积蓄力量增强博士生教育的全球吸引力

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繁荣得益于国家对大

学研究、对企业以及对国家实验室方面的支持与投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冲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以及战略领导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保证美国在 21 世纪全球化社会中的竞争力、繁荣和国家安全,亟需加大投入,着力发展博士生教育,加强科学技术事业的创新力。基于此,美国国家科学院专门委员会于 2007 年发布了题为《站在风暴之上:积蓄力量使美国走向更美好的经济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的基本思想是要求联邦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基础上,稳步增强美国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应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挑战。该报告在开篇便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叶斯·埃克斯罗德 (Julius Axelrod) 的话:“99% 的发现是 1% 的科学家所做出的。”^[7]美国国家科学院专门委员会在考虑诸多建议的基础上,最终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出:“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求学和开展研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培养、招募和保持最好、最优秀的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8]对于培养拔尖科技创新人才的博士生教育而言,在新时期如何不断提升博士生教育的全球吸引力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三)肩负提升博士生教育创新力与竞争力的重任

美国的经济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常常受到世界各国的敬仰。然而,随着各国的迅速发展,美国也面临一些新的竞争和挑战。美国不再认为他们会持续保持原有的创新力与竞争力,也会面临失去受过高级训练劳动力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纷纷对博士生教育给予了较大投入,以此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学生。因此,研究生院委员会号召政策制定者、商业领导人、高等教育官员等进行商讨,试图通过加强对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和支持来推动美国的革新。经过高级训练的劳动力是美国未来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而博士生教育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将创新力与竞争力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鉴于上述潜在危机及竞争力方面的考虑,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于 2007 年 4 月发布了题为《研究生教育:美国竞争力与创新力的支柱》的报告,并指出:博士生教育是未来知识的创造者和革新者,它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国家的安全等具有直接的影响。数十年来,美国和国际学生都认为选择在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在美国就业是其首选,但是事实也表明这种观念正在发生改变。^[9]在此背景下,如何不断提升美国博士生教育的

创新力与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其博士生教育改革与创新的一个重要契机。

三、21 世纪以来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改革策略

如前所述可以看出,美国博士生教育在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突破”的过程。虽然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面对 21 世纪以来新的时代使命,美国博士生教育未来仍将在完善不足、改进质量以及与国际接轨方面继续做出新的抉择与探索。

(一)构建知识共同体,推动“面向世界”的博士生培养

知识共同体是促进博士生知识构建的前提和基础,正如美国历史协会的一则报告所指出的:“从根本上来讲,所有的院系都有相同的目的,即保持知识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学习的进步。研究生项目不只是卷宗档案中的课程、考试和时间。他们需要在思想观念方面保持开放性;在研究、教育和专业问题方面进行公开交流;可以将历史方面的问题置于更大的文化场域下进行探讨。”^[4]从此意义上讲,知识共同体重在协助学生在一种多元化的环境中不断激发自身的各种潜能,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美国学者乔治·沃克 (George E. Walker) 认为,要促进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以及“面向世界”博士生的培养,需通过构建“知识共同体”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未来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如果要获得和利用共同体的相关知识和信息,那么个体便需参与到共同体的实践中,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不是保持着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巴顿·孔斯特勒 (Barton Kunstler) 曾指出:“温室”的条件可以推动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产生,要突出强调集体智慧和实践的价值,他认为许多最伟大成就的发生,恰恰是因为个人在集中的共同行动提升了他们的道德、知识、创造以及集体中每个成员的社会特征。”^[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博士生教育知识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将博士生培养的效果最大化。具体而言,知识共同体主要有四大特征,详见表 1。

的确,上述知识共同体所具备的特征要素对于促进知识、观点的发展、学者的塑造以及推动“面向世界”的博士生培养都不无裨益。但需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以及国际化的日益推进,美国社会正在变得日益多元化。因此,为了促进共同体内博士生教

育整体质量的提升,在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应当注重博士生教育的多样性。对此,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提出了一些策略,如为多样性建立检验机构与标准;协调搭配跨制度的多样性项目;通过不断的评估来强化多样性制度的性能等。^[10]

表1 知识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共享目的 (Shared Purpose)	对于知识共同体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共享目的。如哈特莱特(Hartnett)于1976年就曾指出:学术部门可以被划归为一个共同体,而这不仅可以使部门的目的更加清楚地被理解,而且这种目的可以被广泛地共享。共享目的旨在帮助学生发展成为最好的学者,反过来他们也可以致力于知识的增长与创造。
多样与多个年龄阶段 (Diverse and Multigenerational)	知识共同体能够激发新观点的产生与发展,可以促进成员以多重视角去审视问题,而不是要求对任何事情都达成一致意见。在多样性的刺激之下,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将从这些新的、不同的观点中获益,并且个人与集体知识的构建也得益于这种多样性。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共同体是由多个年龄阶段人员构成的,学生在其中被整合为资历较浅的同事,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带来一些全新的视角。
灵活与宽容 (Flexible and Forgiving)	最有效力的知识共同体是可以为实验和冒险提供机会的。毕竟,学习意味着试误以及对早前一些想法的检验。错误可被看作是力量的源泉,而不是时间或资源的浪费。
尊重与慷慨 (Respectful and Generous)	一般而言,知识共同体的氛围应当是文明的、尊重的和慷慨的。倘若缺乏一个尊重的环境,那就不可能开展真正的知识互动。充满活力的知识共同体中的成员对于他们的时间、观点以及反馈应当是慷慨的。慷慨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应当获得帮助并且取得成功。成功并非是一种“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一个人的成功不会以伤害他人为代价。

资料来源:George E. Walker, Chris M. Golde, Laura Jones, Andrea Conklin Bueschel, Pat Hutchings. The Formation of Scholars: Rethinking Doctoral Education for Twenty - First Century[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8: 125-127.

(二)加强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博士生教育的全球吸引力与竞争力

对于博士生而言,财政支持对于他们在博士学习期间的教学技能和研究水平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于院系而言,他们可以利用财政支持来招募和留住博士生项目中有突出表现的学生,其目的有三:满足大学教学的需要;为教职员提供研究助教;向学生提供激励以促其进步。^[11]相关研究也显示:对于大多数博士生来说,财政支持是影响他们能否获得博士学位最为关键的因素。^[12]正是由于财政支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研究生院长们也将博士生教育的财政支持视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如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于2009年曾开展过一项“紧迫问题调查”,其结果显示:几乎有一半的研究生院院长反映,研究生的资助问题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尤其是来自公立高等院校的研究生院院长更是将财政问题看作是最为紧迫的问题。^[12]

博士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培养“学科代表”——能够创造性地构建新知识,能够极力维护有价值和有益的想法,能够通过写作、教学和应用承担起自身理解的转换。^[13]博士学位代表了研究生教育系统最高水平的学术准备,但是博士生辍学率仍然

是目前美国博士生教育中所面临的一道难题,其中一个突出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因此,联邦政府应该在未来继续为博士生教育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对高级学术研究提供资助,扩大联邦已有的资助项目;对少数天才般的学生,资助应当涵盖他们所有的费用;联邦政府需要保持资助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评估资助的绩效;改进博士项目,尤其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在针对性资助(规定用途)和宽泛资助(未规定用途)间取得平衡;采取更多行动改善处境不利群体接受高级训练的情况。^[14]当然,除了联邦政府加大对博士生教育的投入力度之外,博士生获得资助的来源也是多样的,既有各类奖学金的资助,也有通过各高等院校所提供的助教、助研、助管等获得的资助。由于不同形式的资助对于博士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未来的博士生教育发展中,还需进一步探索多层次、多类型的资助模式和资助类型。

(三)明晰多方问责职责,增强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创新性与有效性

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使命,美国高等院校在保障其质量时,尤为重视加强高等教育的问责,并且在具体的问责过程中还明晰了不同层面的问责职责。

为了增强高等教育问责的有效性,确保高等教育团体、联邦政府、州政府、工商业界人士、各州公民领袖以及高等院校各司其职,约瑟夫·博克(Joseph C. Burke)提出了高等院校有效问责的职责框架。该问责职责框架试图从政府的宏观层面到高等院校的微观层面实施渐进式问责,并且在问责的过程中也明确提出了各个层面问责的具体职责,^[15]确实对具体实践中的高等教育问责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对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博士生教育而言,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也采取了相应地改革策略不断提升博士生教育的水平。在博士生教育发展过程中需进一步明晰联邦政府、州政府、中介组织或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各方问责的具体职责,保证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可以说,问责具体职责的进一步明晰对于增强美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需指出的是,在美国,对于外部问责而言,可能会有统一的标准和指标体系,而对于内部问责而言,要想设立统一的问责标准和指标体系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美国高等院校分权管理的传统,所以各高等院校在办学使命、办学条件以及办学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使是高等院校内部也会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在未来美国高等院校博士生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在制定内部问责具体职责、指标以及实施内部问责时,需根据各院系的具体目标以及相关方面特征制定,以确保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创新性与有效性。

四、结语

博士生教育是美国高等院校的成功之举,人们历尽千辛万苦获得博士学位,是因为他们对追求知识和科学有兴趣以及为了这种追求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当然,他们也想得到一份既能满足自己的兴趣又能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得到报酬的工作。^[16]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博士生教育已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不可否认,美国博士生教育在生产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培养卓越的研究型学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绝大多数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各自的领域都找到了良好的、待遇丰厚的工作。然而,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博士生教育也面临了新的时代使命。在新的时代使命的推动下,美国博士生教育也需适时作出相应战略调整,共同确保未来美国博士生教育质量的

提升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John S. Brubacher & Willis, R..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M].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6: 174.
- [2] Baldridge, J. V.. Policy Making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M]. Jossy-Bass Inc, Publisher, 1978: 250.
- [3] 王英杰.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49.
- [4] George E. Walker, Chris M. Golde, Laura Jones, Andrea Conklin Bueschel, Pat Hutchings. The Formation of Scholars: Rethinking Doctoral Education for Twenty -First Century[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8: 24-26, 121-122, 1, 123.
- [5] 马健生, 陈玥. 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新探索——基于文化理解的视角[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3 (12): 27-31.
- [6] Nerad, M. & Heggelund, M.. Toward a Global Ph. D.? Forces and Forms in Doctoral Education Worldwide [M]. Washington, D. C.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311.
- [7]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R]. Washington, D. C. :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 ix, 162.
- [8] Graduate Education: 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R].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2007: 1-23.
- [9] The Road Ahead: Improving Diversity in Graduate Education[R]. Los Angeles, CA: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2004: 15.
- [10] Ronald G. Ehrenberg, Harriet Zuckerman, Jeffrey A. Groen & Sharon M. Brucker. Educating Scholars: Doctoral Education in the Humanitie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3.
- [11]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The Path Forward: The Fut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R].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0: 16, 37-38.
- [12] Chris M. Golde, George E. Walker, and Associates. 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Doctoral Education: Preparing Stewards of the Discipline Carnegie Essays on the Doctorat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6: 5.
- [13] 黄海刚. “丛林”中的秩序:美国博士教育的变革[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0: 338.
- [14] Joseph C. Burke. 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Balanced Public, Academic, and Market Demands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5: 321-323.

[15]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为美国高等教育辩护 [M]. 别敦荣, 陈艺波, 译.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219.

Missions and Reform Strategies for America's Doct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HEN Yue^{1,2}, ZHAI Yue³

(1.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2. Research Center for Graduat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3.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doctoral education faces different missions in the new era: cultivating “world citizen” doctoral students, gathering strength to increase global appeal, and improving doctor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verall, strategies for the American doctoral education reform are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building 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world-oriented doctoral students;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port to ensure global appeal and competitiveness; clarifying multi-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to improve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docto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doctoral education; era mission; reform strategy

(上接第 27 页)

参考文献:

- [1] 孙霄兵. 以全会精神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J]. 中国高等教育, 2014(22):1.
- [2] 徐显明. 确立依法治校理念 提升依法治校水平[J]. 中国高等教育, 2006(5):12-14.
- [3] 胡建森. 对依法治校的理解和认识[J]. 教育与职业, 2015(1):51.
- [4] 易连云. 关于大学依法治校的几点思考[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4):14-15.
- [5] 湛中乐. 大学法治与权益保障[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7-12.

-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N]. 人民法院报, 2014-12-26(2).
- [7] 江必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南[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7.
- [8] 蒋建湘. 依法治校的核心在于依法行政——以行政合法性原则为视角[J]. 现代大学教育, 2007(1):39-43.
- [9] 李成刚, 许为民, 张国昌. 大学治理结构中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研究——基于四所国外高校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8):11-16.
- [10] 范涛, 梁传杰, 水晶晶. 论高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之构建[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6(2):14-19.

University Governance by Law in Graduate Education

JIANG Qinghua

(Law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Abstract: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s education governance by law, managing universities by law has the core implication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be governed by state laws and administered by sound college regulations. In graduate education, most work is authorized by law as administrative acts. In view of problems in recent years, administration by law in graduate education requires further normalizing such work as re-examination, statu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part from subject setting, academic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and degree awarding, universities should extend the scope of academically-dominant gradu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by school regulations to work like admission, supervision selection, scholarship and award decision and so on. The substantial matters concerned with academic power are part of university autonomy, excluding the external review from government or court. But academic power also needs to follow principles of procedural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judicial review of procedures.

Keywords: university governance by law; graduat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by law; academic autonomy; due procedure